

改革呼唤着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对十年改革的消化与思考

高清海 孟宪忠

§ 1 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十年改革，成绩显著，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出现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对改革这一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缺乏整体把握，没有从社会发展理论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分析，没能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尽管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分别研究改革，但对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似还空白。于是各学科多从自己的视角角度来认识改革、评价改革、引导改革。出现了各学科缺少整体背景，各自过分夸大自己学科、自己思路对改革的价值和意义的情况。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基础，任何一门学科也难找到自己恰当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先导，也很难处理改革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人的效益的关系，处理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也很难避免各项政策带有浓厚的局部性和暂时性色彩。改革中政策出台快、变化快的情况已证明了这一点。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缺乏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已成为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巨大障碍。

十年改革，空前拓展了我国人民的实践广度和深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可供进一步思索的问题。这一切为我们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和可能性。

§ 2 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论起点

中国是地球村的一个村落。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是在世界背景下的改革与现代化。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比较起来既有特殊性也有共性。前车可鉴，他车可鉴。面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西方理论界早在战后就开展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既然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比起来有共同之处，西方理论界通过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现代化研究所得出的理论对我国也必然有借鉴作用。我们不能借口从国情出发、借口一国特色而经验主义地拒绝对西方发展理论进行研究、批判和继承。批判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是我们的理论起点。

简括来看，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第一种是以西方为方向的发展理论：这种理论以西方国家的早期发展为参照，通过第三世界“传统”国家和西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比较，以现代国家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实现发展的途径是通过提高生

产力水平、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工业化程度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这种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种种经济增长模式。如哈罗德-多马模式、罗宾逊模式、卡尔多-刘易斯模式等等。这种理论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第一、经济追踪第一。50—60年代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西方发展理论设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表现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代价太大：环境破坏，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动荡，首先是一小部分官僚贵族实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而广大人民的生活并无太大改善。这一切引起人们深思：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杠杆是否只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否意味着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恶性增长”一些术语的提出，启发人们从只要“经济增长，一切就都会好”的幻梦中逐步清醒过来，从“追踪”的幻梦中清醒过来。

60年代，一些研究发展的学者们放弃了追踪西方国家模式，开始尝试从第三世界国家本身的实际出发，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处境和现实发展道路，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的现实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不能是不切实际地追踪西方的经济指标，不能把改善人们的生活推到国民生产总值大提高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改造以后，而应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逐渐稳步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就业状况如何，才是衡量该国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现实的发展理论改变了“以西化为方向的追踪发展理论”的目标，所以，这一理论反对过多过快的产业结构改造、技术变化和资本支出，注意通过农业化肥、水利、机械投资来提高农业产出，而不盲目的农转工、农转商。

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更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群众必然从经济增长获得生活质量提高这一事实，引起国外学者们对发展概念和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反思。弗朗索瓦·佩鲁、依安·米勒斯等一大批学者在70年代前后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人才是发展的最高要求。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评价发展的价值前提，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平等、根除贫困、人的自由、生态平衡、民主。不实现这些价值，虽有经济增长也不会有人与社会的发展，即人与社会的发展决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而还取决于政治发展、教育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与“追踪理论”的最大区别是从对物、对经济增长的重视转向了对人的重视，把“增长第一”转向为“发展第一”。

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实践和历史上依次递进的三种发展理论启发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发展理论？怎么样进行我们的发展实践？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全面研究三代发展理论，吸收其合理思想，而不能鼠目寸光的只停止在以西方国家为模式的第一代发展理论的水平上。刻舟求剑终难得。我国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时期已大不一样，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完全走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生产的道路已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城市化、农业改造过程中，人口、能源、生态问题都不象现在这样严重，所以虽然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危害尚还不小。今天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改造过程，如果不加强计划、预测，给生态环境、给进一步发展造成的损害，给人造成的损害可能是不可弥补的。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一种掠夺式的积累，这种积累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今天我们发展生产如果也以此两极分化的方式积累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同时，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

已经决定发展经济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最高最终目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发展才是最高目的。这也必然要求我们注意在改革中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注重人的发展,而不能只把改革过程作为付代价的过程,把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发展都推到实现了现代化再去实现。如果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不能切实感受到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感受到改革对自身发展的价值,就会失去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关心和支持。所以,在三代发展理论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发展理论最为可取。无视三代发展理论的成果,只在第一代理论基础上把发展只理解为经济增长则是不可取的。

§ 3 材料、理论、方法

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是想按玄思的方式去建立什么理论体系,而是通过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十年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面临的矛盾和冲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发展理论,运用综合方法,对现实作出理论的分析,在分析中创造理论。

找准问题、分析问题的实质、对问题给出理论评价,这是重要的一步。

在对现实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发展理论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 4 社会发展的目标

任何发展都是有目标的,但目标的确定及设置却不一定都合理。社会发展的目标不能等同于经济目标,更不能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社会发展目标是一个目标系统。从领域上看区分为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从客体主体上看,区分为物质目标与人的目标,从直接性间接性上看,区分为直接目标、间接目标、暂时目标和长远目标,各个目标在目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各个目标之间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片面地夸大某一个目标的价值和意义、放大某一目标的地位,或者为了暂时的目标,忽视长远的目标,都要造成发展系统目标、系统质的畸变。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地区和单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惜能源高消耗、资源高消耗、无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结果生产虽然暂时上去了,但使资源、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从而经济增长不但难以维持,同时人的生活质量因生态破坏也严重下降。据国外学者研究,我国十年来工业发展规模和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与资源消耗、生态损害之比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资源投入最多,生态损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实警告我们必须把保护环境也作为发展目标之一,决不能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在改革过程中,缺乏系统发展目标还表现在我们缺少人的主体目标设计。仿佛在改革中人只是经济人,只是生产力,只是创造经济效益的工具,人自身没有发展目标和要求。结果现在全国有上千万中小学生失学、辍学,童工、童农、童商、童贩现象相当严重。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中国未来的主体,如果未来的主体都是一些文盲,中国何以能进步发展?全面认识、合理配置发展目标,这是我们建立中国发展理论首先遇到的问题。

§ 5 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分析了国内的社会结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社会不存在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不意味着在改革中不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

和社会阶层，不意味着不需要对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进行分析。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触动、变革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的利益，必然引起利益集团、社会阶层对改革的不同态度。由于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与现代工业、商品生产的关系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意识追求不同，对改革的态度不同，不同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可以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利益集团、社会阶层都是改革的力量，没有改革的对象，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不能分析哪些阶层是改革的主导力量，哪些阶层在改革中更要多受教育以提高自己，哪些阶层是改革的基本力量，哪些阶层是改革中依靠的力量。比如，我们强调全社会都应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其重要原因是因为，从根本上说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一支中坚力量，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方向是一致的。确定了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进一步就要研究各集团各阶层所付的代价结构。研究怎样避免代价主体与获益主体的分离。在改革中，人民群众应该准备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如果付出的代价过重，所付出的代价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补偿，而另有利益集团、社会阶层在不付代价、少付代价的情况下获得了重大利益，这就是代价主体与获益主体分离，而这种分离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 6 发展的途径

发展的目标制约发展的途径。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是经济第一的模式，是通过提高生产力、通过工业、农业二元结构改造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经济增长后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与我国改革实践都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其他问题，实现其他目标，例如政治民主、为政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并不是伴随经济增长自然就解决的。经济增长了可能为解决上述问题创造条件，也可能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障碍。经济增长后分配不公平，可能造成权力与金钱的结合，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不乏其例，国民收入略有增加超过欧美式消费的也是屡见不鲜之事。所以政治民主、发展教育等自身作为发展的目标有其独特的发展途径和发展要求，不能待到经济增长后再去解决。在一些同志之中存在着一种心理：一切问题都在于经济增长不够，以为先要有经济增长，然后才能谈其他；经济增长后其他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就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改革中的法制建设、加强教育，经济能否真正增长？二是在经济增长后，还能否顺利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发展教育？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深思。在现阶段，我国政治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大。经济决策和利益的分配实质上还是通过政治实现的，失误的决策和不公平的分配、不廉洁的政治活动都严重地损害了经济效益。1987年我国国民总收入近一万亿元人民币。可据抽样计算决策失误损失、贪污漏税、公款吃喝、侵占公款、外汇的非生产性使用等加起来就达近一千亿元。从一定意义讲这一千多亿的损失均是由于政治行为、违法行为造成。如果年度国民收入损失达十分之一，还怎么保证实现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留待经济增长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无疑给发展留下障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法制建设，经济增长必然导致不公平分配和增大各种非劳动收入比例。如××市现在居民储蓄总额已超百亿，而这百亿财富的64%集中在4%人的手里。据调查，占有65亿元的5万人绝大多数是在流通领域经商和中小企业承包经营者，国家厂矿企业干部中“官倒”和“大倒”，科技人员、教师、一般国家干部极少。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在短短

的几年中，这些人是怎样积聚这些财富的，这些财富积聚过程是否创造了价值，这些人积聚了财富是否进行生产性投资？结论似不乐观。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把商品生产奠基在法制基础上，官商结合，官倒、大倒集中财富形成新的社会势力，将给社会带来严重压力，越来越难以解决。我们认为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法制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新秩序、为政清廉的改革配套，是及时和必要的。所以，我们认为不要再去争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谁先谁后，公平效率哪个重要。改革的全面目标和改革的现实要求现在必须实现配套改革，实现在起点、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开展竞争，不能再单思路地把经济视作唯一的目标，把增长经济视为发展的唯一途径。

§ 7 发展的协调

哲学界近些年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人们较普遍认识到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面前人不是无能为力的被动主体，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主体。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他的选择作用对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途径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哲学界这一研究成果应该吸收到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中，这一成果应该指导与参与改革的实践。我们似应认识到：发展不是社会历史规律脱离人的作用的结果，主体要对发展加以协调。协调发展是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改革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任何地区、城市、行业、企业，其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发展均应追求动态的平衡，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发展中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诸方面必须处在一定比例之中。比例倾斜，某一指标可能上去，但破坏了发展的系统质。例如，近两年某些省、市的发展目标就带有单纯追求产值、利润的片面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发展不协调状态。一些企业、地区是靠着掠夺式经营资源，靠着高消耗、高污染实现了高产值、高利润的。我国现有的130多个森林经营局，其中有四分之一不是保护性开发，而是只砍不种。虽然短期内产值、利润上去了，但不留青山在，不但造成今后木材短缺，而且造成生态破坏。随着生态问题的明朗，随着不协调状况的持续和扩大，逼着上去了的行业或指标又下了或降下来，一上一下几年一调整，损失极为严重，有的甚至难以调整。北京水危机，迫使原来建设的那些耗水量很大的产业和行业，面临新的抉择。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的一些自然资源从绝对量来看，虽然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但从人均值看，我国的净水、森林、主要矿产都在世界人均值之下。我们再不能片面追求产值、利润，而损害我国的生态和高耗资源了。

协调发展，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对发展进行控制和调整。控制和调整，包括对发展目标的适当调控，对发展途径的调控，对发展力量结构的调控，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调控。调控就是处理关系，而处理关系就是避免单因素论、单打一。

§ 8 发展中人的问题

鉴于我们在改革中对人的问题重视和研究不够，我们认为发展中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更大关注。

发展中人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功能方面和目标方面。功能方面是指人是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发展生产，完善体制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目标方面是指社会主义改革不仅要有生产力发展目标，经济发展目标，还要有人的主体目标，即在改革实践中提高人的素质，实现

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不论从功能方面还是从主体目标方面来看，都需要我们加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

先从改革中发挥人的功能角度看。

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的总趋势提高、突出了人的因素的作用。

改革是一场提高生产力的革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社会化规模的扩大，社会系统的强化，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这不仅要求劳动者个人有更高的劳动技能，而且对劳动者的责任心、道德感、纪律性的要求也提高了，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独立决策能力的要求也提高了。劳动者如果不适应上述要求，不但不能很好地在生产劳动中发挥作用、创造价值，还会造成人为的事故和巨大的损失。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数十亿损失，就是由于劳动者不遵守劳动纪律所致，在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的铁路恶性事故，主要是人的因素造成的。所以，在改革中，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的问题，注意提高人的素质，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改革中，实现个人生产力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也要求解决“人的问题”。

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曾提出了“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这两个范畴。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生产力是人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体力、智力和劳动技能的总和。个人生产力通过劳动方式、协作、分工、管理等中介形成社会生产力。

“个人生产力”状况对社会生产力有重要影响。在前一阶段改革实践中，人们看到了我国劳动方式、管理方式落后，比较注重劳动方式、管理方式“硬件”方面的改革，并试图通过这些改革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改革中，人们却忽视了对如何充分发挥个人生产力的研究，以致在发挥个人生产力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在一些工厂中，工人责任心不强，纪律松懈，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不高，竞赛流于形式，奖金起不到鼓励生产积极性的作用，消极情绪蔓延滋生，甚至大量盗拿生产资料、工厂设备。领导对这些现象也视而不见，明哲保身。据一些报纸报露，在一些工厂全力以赴工作的只占三分之一、甚至有“隐形怠工”现象。这些现象说明，只从劳动方式、管理等“个人生产力”结合为“社会生产力”的结构方式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研究激活“个人生产力”的途径，研究人的问题。

再从改革中主体发展目标看。

我们的改革应该是一个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价值的过程。我们搞改革，搞现代化，不是为了搞改革而搞改革，为了搞现代化而搞现代化。就其最高目的而言只能是为了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主体价值，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人的主体性。

在改革过程中，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主体价值，把经济收入、个人消费看成主体的最大价值所在。仿佛把人人都变成“能挣会花”的经济动物，就是实现了主体价值。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也模糊了人们对主体价值的认识，以致许多人把改革和现代化只看成是一场经济达标事业，把人只看成是达到经济指标的工具、手段，而忘记了在改革过程中实现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价值正是改革和现代化的主体目标。

在一定意义上说，主体为了实现未来的目的，必须把自身的现实异化为手段。但是，这种异化是有限的，是以不失去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只把人当成生产的工具和手段，把人只当成感性动物，这是与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衷相悖的。这些情况的出现，暴露了我们在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目标的制定和宣传中，对主体目标的研究、宣传重视不够。

我们的改革，也是人们学习进入现代社会、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学校，实现人的发展的学

校。在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全社会要以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价值为主体目标，另一方面人们也必须自觉地把改革、现代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校，自觉地把自已作为对象来完善。改革的过程不仅是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而且是改革人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也不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心理倾向、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的现代化过程，人的发展过程。在改革实践中，人们对各种体制改革比较注重，而对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却有所忽视，其不良后果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了。“改革人物”步鑫生沉浮的历程，最充分地说明了，任何人都要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自觉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否则势必落伍。

§ 9 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改革、发展作为一场社会变革，必然引起社会的震荡，诱发一些社会问题。这要求我们从发展社会学角度研究这些社会问题，而不是从一般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从发展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下列社会问题急待研究、给出科学认识。

第一，经济活动在社会上的非经济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批判了极“左”思潮，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个体户在促进社会生产，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非经济方面，个体户的负作用却没有给以系统的评价，并制定相应的对策。个体户在购货、销售过程中直接使用现金，存在着大量行贿行为，在缴税过程中收买税务人员逃避税收的也是司空见惯，违犯法律，腐化了社会空气。

第二，社会性短期行为。不仅是工矿企业存在短期行为，教育、科研、文化、卫生领域也存在短期行为。举凡涉及基础性的投资，人们能减就减。工业生产中挤设备、压缩基础性投资，农业生产中土地投入逐年减少，教育投资增长落后于行政投资，使得全社会发展缺少后劲。

第三、社会性失控。改革与发展意味着要改变旧有的秩序，意味着要引起一些震荡。但社会不能失去控制，不能让社会自行震荡。现在计划失控、投资失控、消费失控、交通失控、办学失控，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失控现象。现实极需要对社会性失控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性伪劣行为。现在不仅是个别商品假冒伪劣，而是衍成了社会性伪劣行为。各类商品假劣，不过是社会行为假劣的物化表现。吃、穿、住、行，举凡人所涉一切，几乎都有假冒。如不采取措施，制定对策，在社会性伪劣行为的冲击下，改革和发展也难免变质。

第五，社会性腐败现象。社会腐败现象严重已为人有目共睹。从广度上看，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腐败现象。挥霍浪费、奢侈胡为，已令人发指。腐败必然无能。如不彻底根治社会腐败行为，社会就会在腐败中崩溃。

第六，新的犯罪问题。近些年，除重大经济案件增多外，集团案件、赌博、卖淫、青少年犯罪也急剧增加，甚至黑社会现象如恐吓、诱拐、代人犯罪、替人入狱、雇佣杀手也开始出现。法律制定要有预见性。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综合治理，使得改革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保障。

我们认为，以上六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

〔作者工作单位：吉林大学〕